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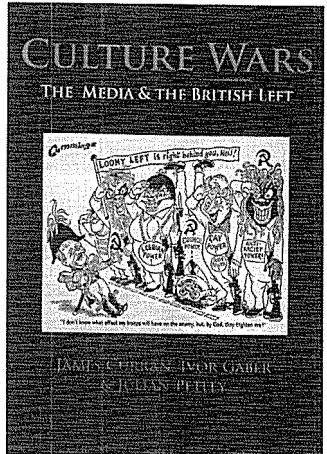
媒體與政治

蔡明燁 ◎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暨文字工作者

最近拜讀三位傳播學大師——James Curran, Ivor Gaber, Julian Petley所合著的《文化之戰：媒體與英國左派》（*Culture Wars: The Media and the British Left*）一書，感觸很深，發現媒體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不僅會影響政治的發展與媒體的運作，竟然還會影響到文化價值觀！舉例來說，威權時代的臺灣自有一套主流文化價值觀，長期以來經過了民主化的洗禮、反對黨的抗爭和異議媒體的挑戰之後，原先這套以中華民國至上的文化價值觀，終於蛻變成以臺灣為前提，於是2000年的大選才有民進黨的翻天。可是當根植本土和愛臺灣成為主流意識之後，民進黨便失去了原先的優勢，因為所有的政黨都必須在這個新成立的基點上重新出發、整合，提出更能說服選民的政策，才能重新掌權。

其實，本書討論的對象不是臺灣，我只是從書中的實例舉一反三，有感而發而已。書中探討1980年代期間，英國境內所謂的城市左派（Urban Left）地方型年輕政客，與中央政府的右派老政客之間爆發的激烈衝突。三位作者指出，一般認為此一衝突是政治右派與左派之爭，但實際上更應該被看成是兩代之爭，是一種代溝所造成的無法彌補的差距——也就是說，一端是成長於1940年代的社會中堅，經歷了大英帝國的輝煌時期，因此他們的教育背景、信仰和價值觀，深深受到舊時代思維的影響，如1980年代中期的鐵娘子內閣，便都是這樣出身的一批政客；與他們相對的另一端，則是成長於1960年代的新秀，他們受到了自由主義思潮的衝擊，追求解放、改革，更親身經歷了勞工階層的崛起，因此他們所熟悉的英國，早已不是帝國的面目，從而揚棄了各種帝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包袱。

換句話說，這種兩代之間的抗爭，所爭者乃在於價值觀，影響所及不只在於文化面，也在政治面與經濟面。舉例來說，當社會暴動發生時，柴契爾政府習於將暴動群眾視為歹徒，因為對保守黨內閣而言，這純粹是一個社會治安的問題；但是當時的左派人士卻將此議題視為更加複雜的制度問題，追究社會不安的起因——包括警





方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、社會福利的不健全、乃至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等——期能追求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大幅改革。難怪當年輕的左派政客在1980年代中期贏得地方選舉，入主大倫敦地區的幾個區政府（town hall）後，他們的觀念和作風會招致右派的英國小報一致反對，以長期的惡意報導運動將工黨的左派份子（Labour Left）貶抑成「瘋狂左派（Loony Left）」，抨擊他們對少數族群和邊緣議題有著非理性的狂熱，全力在子虛烏有的種族與性別問題上鑽營。

《文化之戰》書中首先對柴契爾時期以來的英國政治做了概括性的說明，描述在右派政治大行其道的國內及國際氛圍中，一股對權威不信任、不在乎的文化，開始在英國民間透過對政治嘻笑怒罵的電視喜劇節目逐漸蔓延開來，為劍拔弩張的政治對話架起了社會舞臺。三位作者對這段時期的媒體報導做了詳盡的分析，突顯出大倫敦委員會（Greater London Council，簡稱GLC）如何被一窩蜂的小報塑造成馬克思信徒、毫不民主及政治動盪的形象，並以豐富的實例舉證GLC如何被抹黑、如何被視為工黨的笑柄，為保守黨政府解散GLC的意圖製造口實。

此外，作者們也強調媒體報導本身的不一致，例如電視新聞有「平衡報導」的規約，所以全國性電視新聞的播報會比較持平，至於在電視地方新聞中，以及地方性的報紙上，GLC的各種活動和政策其實經常出現正面的報導與評價，也因此作者們指出了當時一個弔詭的現象：因為小報是對全國發行，他們對GLC的報導往往使倫敦之外的英國民眾對大倫敦委員會不敢恭維；可是大倫敦地區的居民對GLC的觀感卻正面得多，因此當保守黨提出了解散GLC的方案後，GLC卻有能力展開一連串的反擊，爭取當地居民的支持與認同，最後反而導致GLC的擴大權能，改組為大倫敦主管機構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），亦即今天的倫敦市政府。

當工黨在1987年的大選再度落敗後，媒體做出了各種與左派政治相關的詮釋，促使工黨內部決心自我改革，以求走上主政之路。工黨領導人開始在各種場合亮出「新工黨（New Labour）」的招牌，並試圖和所謂的「瘋狂左派」劃清界線，東尼布萊爾（Tony Blair）更努力宣揚新工黨已經改頭換面，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政黨，而「瘋狂左派」人士對改革的反對呼聲越高，新工黨不同於舊工黨的訊息自然也就更加突顯。正因如此，「瘋狂左派」的代表人物肯尼利文斯頓（Ken Livingston）在1990年代當選倫敦市長，才會被視為具有極高的爭議性，彷彿當眾打了布萊爾一個耳光！但即使如此，做為一個「瘋狂左派」的政治人物終究必須付出代價，利文斯頓在2003年為了解決倫敦市區的交通問題制定了新政策，要求進入倫敦市區的車輛必須繳費，受到媒體的一致撻伐，無論廣播或平面媒體，同聲譴責此一措施的愚昧，認為不可能產生任何效果！孰料事實證明此一方案極為成功，大幅緩和了困擾倫敦市民的交通阻塞，促使英國其他城市紛紛考慮跟進，可見媒體對工黨左派的偏見之深，竟一再製造了不堪一擊的媒體「神話」。

然而有趣的是，當許多1960年代新秀的價值觀，例如反種族歧視、打破社會階級、爭取性別平等、支持弱勢族群（包括同性戀）、追求公義社會等觀念，都已成為今天普同的思潮之

後，左右兩派政黨的爭論便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基點上，因此我們發現今天的保守黨言論，在文化層面上可以說已和新工黨異曲同工，因此繼肯尼利文斯頓之後，新當選的倫敦市長竟是保守黨的大將包瑞斯強森（Boris Johnson），同時新工黨在主政12年之後，一般預料2010年的英國大選保守黨極可能勢如破竹。

本書作者們在探討媒體的政治影響力時，強調媒體對大眾的態度及行為並無決定性的影響，但一般大眾卻都相信媒體的力量無遠弗屆，此類研究最著名的學者莫過於諾曼瓊姆斯基（Noam Chomsky）。作者們表示，我們既不應誇大媒體的影響力，也不應忽略其影響力，因為媒體影響力的大小決定於受眾既存的態度，以及媒體所操作的大環境本身，換句話說，本書最大的貢獻，在於以豐富的實證資料和淺顯易懂的文字，生動描繪出了政治和媒體之間複雜的互動，使我們充分瞭解到為什麼1960年代的文化價值觀，會在今天變成了英國的主流政治，而世代間的文化戰爭，又是如何不間斷地爭鬥著，影響新時代的思維與認同，乃至於政黨的輪替，而其間的普同性，自不免也增加了我們對國內媒體與政治之互動，以及社會主流價值觀之變遷的洞察。

延伸閱讀

- James Curran, Ivor Gaber, Julian Petley.(2005). *Cultural wars: the media and the British left*. Edinburgh: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. ISBN 9780748619177.